前　言

敦煌是我国甘肃省最西端的县级市，在1987年改为市之前它仅仅是一个小县。可是这个边远小县的知名度却远远超出中州大郡，不但国内海外皆知，更令全国全世界钦仰。究其原因，诚然是因为它拥有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艺术，及在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数万件古代文书。但是，无论艺术还是文化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乐僔在鸣沙山麓首开第一个佛窟是肇源于三危山顶佛光的启示，有些偶然，那么此后一千多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蓬勃发展却是古代敦煌社会、宗教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藏经洞文书历时千年而不毁是得益于西北气候干燥、水份稀少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么如此庞博的文献产生并封存于此处却是敦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所致，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在“敦煌热”勃兴全球的今日，探讨敦煌艺术与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即敦煌的历史就不是多余，而是必需的了。

本书略分8部分54小节，其中前面7部分介绍敦煌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依时代排序，对个别需要集中叙述的问题（如敦煌文书的流散），则稍稍打破时间界限，集中介绍。最后一部分简介敦煌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和敦煌学史，分专题阐释。但愿本书能为有兴趣了解敦煌和敦煌学这一当今文化热点的读者提供一些常识与线索。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新达先生、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孙晓林女士等学者的热情指点帮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也为本书付出了许多精力，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稿完成于 1994 年。由于笔者学识浅薄，时间又较为仓促，文中定会存在不少疏误之处，恳请学者师长不吝赐教，笔者先此致谢！

引　言

1.“敦煌”一名的涵义与来源

史籍中关于敦煌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所引张骞的出使报告中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即是“敦煌”一名的首次出现，此后这一地名历代相传，沿用至今，但关于它的语源与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确知了，学者们遂各抒己见，争论不已，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目前对“敦煌”一名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汉语之字面意义进行解释，认为“敦”意为“大”，“煌”意为“盛”。东汉应劭首倡此说，唐代的李吉甫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后来的学者也乐于将它作为一个佐证，用以说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古代中西交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查考当时字书并无此意，陈、郑之间虽然有将“敦”解作“大”的方言，可其地与敦煌相距遥远，未必能同语同俗。况且如按这种说法，“敦煌”当是汉武帝建郡时的汉语命名，而事实上这一地名很可能在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就出现了，只是被后来的郡县所沿用而已。因而此说大约是敦煌成为

丝路重镇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理解，不一定就是它的原义。

另一类是从字音方面进行解释，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译音，或曰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随着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进展，现在人们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更深理解，这种观点也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它究竟源出于哪种少数民族语言，又存在着众多异说。其中较常见的说法有：源于吐火罗语，是族名“吐火罗”的简译，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一样，均为“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的汉语对音；源于其地所居戎狄语言，属突厥语族，词意为绵亘的大山，西汉因山而命名当地郡县以后，“敦煌”才由山名转变为地名；源于羌语，为“朵航”对音，意指“诵经地”、“诵经处”，等等。

2．敦煌地区的地理与气候

我国黄河以西的地区自古称为“河西”，因它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数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犹如一条天然长廊，所以又被称为“河西走廊”。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现在的敦煌市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东临安西县，南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西与新疆诺羌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接壤。古时敦煌周边邻地的名称变化无定，其西部的广袤地区则总称西

域，西行者必须经敦煌才能入西域而更至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敦煌乃是古代使团商队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敦煌地区内部的地理环境是南为三危山、鸣沙山，北为戈壁，中部则是党河下游冲积而成的一块平原，从古至今的敦煌人民便主要活动在这块平原上。

敦煌位居亚洲内陆，当地属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年降水量不到 50 毫米，远远低于蒸发量，但其他水源较为充沛，敦煌南倚祁连山，山上丰富的雪水为它带来了勃勃生机。祁连山高峰海拔达 4000 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人称“冰源水库”，其冰川的大部分又都分布于北坡，春夏时节冰雪消融，雪水流入走廊，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并缘河形成了几片绿洲。敦煌就位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这块绿洲面积较大，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是沙漠、戈壁包围着的一方难得的“生命之洲”。

3. 敦煌地区的早期居民

敦煌地区至晚在上古时期就已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遗址，敦煌正位于这些古文化分布区内。

我们现今所知道的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约公元前 1600 多年以前的，相当于中原夏代的玉门市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火烧沟类型文化的主人。考古发掘表明火烧沟人和中原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他们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已有了一定的交换关系。

继火烧沟人而起的是玉门市骟马类型文化的主人。1957 年甘肃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骟马城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已相当进步。

但总起来说，目前我们对战国以前敦煌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进一步补充。

战国至秦汉时期，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间相互角逐，迁徙频繁，先后在这里居住的有过着游牧生活的塞种胡人、乌孙人、月氏人和匈奴人等。

初时最为强大的是月氏人，早在战国时代他们就已是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到秦朝时更有可执弓攻战之士 10 余万，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在河西，月氏先合并了瓜州之戎，后又将世居敦煌的塞种胡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更对原来或为敦煌地区主人的乌孙发起了进攻，乌孙王难兜靡战死，部众亡走匈奴，难兜靡的幼子昆莫也被带到了匈奴，被冒顿（mòdú，墨毒）单于收养，月氏遂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疏勒河流域。

但是，月氏控制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

就被中国北方的另一个强大民族——匈奴击败而大举西迁。

匈奴是一个强悍的古老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当月氏强盛时，匈奴头曼单于曾将太子冒顿送交月氏为人质。秦汉之际，冒顿逃归，杀父自立，逐渐统一了匈奴各部，并发兵征服了月氏，至中原西汉文帝时，其子老上单于更杀掉了月氏王，迫使月氏部众远遁西去，留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少数月氏遗民只得寄身于南山的羌族，被称为小月氏，以后逐渐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

当冒顿征战月氏时，他收留的乌孙王难兜靡的儿子昆莫也已长大，并为匈奴屡建战功，深受冒顿喜爱，于是冒顿便将大批乌孙部众交还昆莫，让他们继续生活于敦煌地区，直至公元前 174 年冒顿死后，昆莫才率领乌孙部众远徙至伊犁河流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河西之地终为匈奴所尽有，成为匈奴右贤王部下的休屠王、浑邪王的辖地。那时休屠王在东，辖今武威地，浑邪王在西，辖今张掖地，敦煌即处于他们的统治范围之内。

一、两汉时期的敦煌

汉代是敦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正是在汉代，发生了张骞凿空、征战匈奴、设立郡县、徙民实边、用兵西域、开拓丝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正是在汉代，河西走廊从地理的走廊发展成了历史的走廊，敦煌从荒僻的边地发展成了繁荣的重镇。可以说，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是敦煌地区的开拓者，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基于西汉，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起始于西汉。

1.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曾经经历过几次反复。

早在刘邦建国不久，强大的匈奴就已成为西汉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铁骑不断南下寇边，虏掠人畜、财物，破坏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终于迫使汉朝动用武力，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00 年）由刘邦亲率大军与匈奴激战于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结果是汉军失利，陷入重围，断水断粮 7 日，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巧用陈平计策突围，高祖等才得生还。这次的失利表明，在社会经济凋敝，割据势力严重，国力虚弱的汉初，中原

王朝还无力抗击骠悍的匈奴。所以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与匈奴言和，采用和亲的政策以求苟安，将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音 yān zhī ，指王后），并赠送大量丝织物、酒类等，以维持和平局面。从高祖到武帝，西汉曾先后将 4 位公主远嫁匈奴单于。

但是，“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西汉的妥协并没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仍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地，并恣意向各方扩张其势力范围，特别是月氏和乌孙相继西迁后，匈奴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对汉朝西北边地的直接威胁更大了。河西水草丰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河西又位居要冲，匈奴据此，南可与羌人相勾结，西可控制西域，把持住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断汉朝和西域的联系，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在西域设置了僮仆（意为奴隶）都尉征敛赋税，大大加强了其军力、物力。到汉武帝登极时，匈奴环处于西汉王朝的西北方，已成为汉朝最严重的边患，而河西与西域正是其对西汉进击的一只强有力的右臂。

不过，汉武帝时的西汉已不再疲弱可欺。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其中央集权已得到加强和巩固，“文景之治”的积极成果也使西汉经济发达、国力大增，士兵、军马及军械粮用都很充实，完全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壮盛之年在位执政，征讨匈奴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 张骞出使西域

为打败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首先进行了一番周密筹划。当时西汉已和匈奴进行过小规模争斗，俘虏了一些匈奴人。汉武帝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单于打败月氏王以后，曾命人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酒器，因而大月氏西迁后仍然十分怨恨匈奴，新王一直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势单力薄，没有同盟者而不敢妄动。据此，汉武帝遂设想与大月氏联手，合击匈奴。

但是月氏居地与汉地相距遥远，要想到那儿去必须经过匈奴人占领的河西地区，当时汉朝人对河西和西域地区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都很有限，路途艰险莫测，出使任务十分艰巨，很难找到合适的使者，汉武帝只得在全国进行公开招募。

应募者中有一位郎官，非常机智果敢，强健刚毅，此人就是后来名播中外的张骞。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一说建元三年），中选者张骞率领 100 多人的使团，由奴隶出身的甘父作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西进。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人俘获，匈奴单于不允许他们经过匈奴控制区出使月氏，将他们扣留了 10 年，并为张骞娶妻，后来还有了孩子。但是张骞始终不忘汉廷使命，至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终于逃离匈奴地区，到达大宛、康居，并最终抵达大月氏。

可是此时的大月氏已征服了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由游牧生活开始向农耕、定居转变，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很少受到外敌的侵扰。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再与匈奴争斗，没有答应汉朝合击匈奴的要求。张骞在其附近考察了一年多，于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踏上归途，在经过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虏获，直到一年多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 130 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携妻带子，与甘父一同回到了汉朝。

张骞此行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政治使命，但意义却远远超出其直接使命之外。早在张骞之前，我国史籍中就有过一些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但是作为官方使节，张骞却是中原王朝出使西域的第一人，因而司马迁将他这次出使称为“凿空”西域。张骞此行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书写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同时他还带回了有关西域等地的大量见闻和丰富知识，开扩了汉人的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张骞还朝后，曾就此行向汉武帝呈交了一个翔实具体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所经各地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以及风俗习惯等，为汉朝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报告后来被收入《汉书·西域传》，是我国有史以来有关敦煌河西及西域地区最早的确切记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 13 载，去时 100 多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

归来时却只有他和甘父 2 人，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将他们分别封为太中大夫、奉使君。

3. 汉武帝时争夺河西敦煌的军事举措

与派出张骞同时，汉武帝也开始进行军事准备，以便随时与月氏联合，武力征讨匈奴。但张骞一去多年，杳无音信，而匈奴却频频侵犯汉境，汉武帝不得不作出了单独反击匈奴的决定。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以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 3 大战役最具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敦煌河西地区的繁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战。汉武帝组织这场大战役的目的就在于争夺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这场战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春，是春，汉武帝派遣青年将领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迂回，汉朝军将翻越祁连山，横扫匈奴五属国，转战 6 日，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进击 1000 多里，杀掉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损近万人。

第二阶段在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两路出北地和陇西进击匈奴，尽管公孙敖军在进军途中迷失方向，使原作战方案落空，但霍去病一路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霍去病率军大战 2000 里，渡过居延泽，直逼祁连山，斩、虏匈奴 3 万余

人，基本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力量。

河西之战汉军两次歼敌共 4 万余人，使匈奴贵族受到沉重打击。但更重要的是汉军的胜利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长期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因在河西之战中惨败，遭到了匈奴单于的猜忌和怨恨，单于准备将他们召回王廷处死。休屠王和浑邪王得知大祸临头，便决定归降汉朝，并派人同汉朝取得了联系。元狩三年（公元前 122 年）秋，汉武帝派霍去病领兵相迎，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霍去病也率兵杀掉了匈奴哗变士兵 8000 多人，护送浑邪王及其部众 4 万余人归降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及其亲信数人为侯，并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 5 郡故塞之外，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之战大获全胜。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得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版图，西汉王朝开始据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

4.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西关系的发展

汉军打败匈奴之后，张骞便向汉武帝建议派使者出使乌孙，与乌孙联合，以巩固反击匈奴的战果。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很快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拜他为中郎将，于元狩四年（公元前 123 年）再次

西行。

张骞此次出使与前次相比大不一样。首先，使团的组成远较前次庞大、壮观，它既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又是一支规模宏大的商队。这个使团中除张骞外还有许多持节副使，可以沿途分赴各地，扩大交往范围，其他随员也成倍增加，共有随从300 人，每人各备两匹马，又携带着成千上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及1 万多头牛羊，可以与所到诸国进行物资交换。其次，使者们所面对的形势要比前次优越得多，此时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处在西汉的统治之下，使者们不必再过多担心匈奴骑兵的袭击，可以跃马扬鞭，顺利前行了。因而这次张骞所率的使团很快就到达了乌孙。

只是乌孙王已经年老体衰，国内又纷争不安，对汉武帝劝他们东迁故地，共击匈奴的事一直定不下来。于是张骞便把副使们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自己则携同乌孙的答谢使者一同返还。元鼎二年（公元前115 年）张骞回到长安，被汉武帝拜为大行令（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改为大鸿胪），第二年便去世了。

张骞死后一年多，他当初在乌孙派往大夏等地的使者都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陆续回到了汉朝。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便开始和汉朝正式交通往来，中西交往更为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外国使者多者一起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中国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

起或十余起。通过频繁的交往，中国的文化与物产，特别是丝绸源源不断地传向西方，西方的火浣布等也传入了中国。这些交往既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使位于丝路必经之地的敦煌变成了总绾东西的交通枢纽。此后，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实行进一步的开发经营，为敦煌以后的繁荣兴盛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对于敦煌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敦煌人民从没有忘却张骞的功绩，今日莫高窟中还存有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

5．敦煌郡的设立

占有河西地区以后，为施行有效统治，西汉先是于元狩二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区设立“酒泉玉门都尉”，隶属于邻近的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故数年后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设张掖郡和敦煌郡，与先设的 2 郡合称“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认为四郡的设立次第是先酒泉、张掖，后敦煌、武威）。

关于敦煌郡的确切设置年代，历来异说纷陈。最早的为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说，最晚的为后元元年（公元前 88 年）。出现众多歧说的原因在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各不相同，即便是《史记》中的《匈奴列传》与《大宛列传》，《汉书》

中的《武帝纪》、《食货志》和《地理志》之间的记载也自相矛盾，而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与《汉书》的载录又不完全一致。学者们每每援引的是《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和《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现在流行诸说所主张的敦煌建郡年代皆在上限元鼎六年和下限后元元年范围之内，尤以元鼎六年说更易为人接受。

敦煌郡的建立是敦煌史上的大事，是敦煌正式划归汉帝国版图的开始，是确立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关键的一步，而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始于敦煌郡的建立。

西汉时敦煌郡管辖的范围东及渊泉（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西到阳关（今敦煌市南湖乡），北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实际上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包括今敦煌市、玉门市西部、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以及新疆哈密市、焉耆回族自治县、库尔勒县、若羌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公里（见图 1）。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期的敦煌郡统辖 6 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县，其具体情况大致是：

敦煌县，为郡治所在，其郡治位于今敦煌城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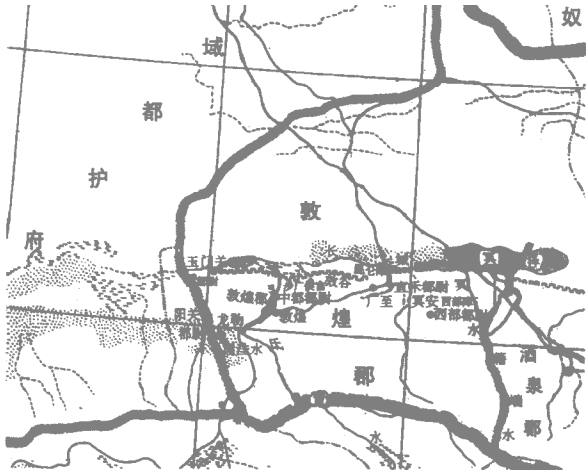


图 1　西汉敦煌郡简图

南，滨临党河西岸（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即 1725 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郡治），该县主要分布在党河东西两岸的绿洲之上。

冥安县，得名于冥水，冥水即今疏勒河。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为：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效谷县，其县治的确切位置，目前尚有争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的墩墩湾故城即是汉效谷县城。该县因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济南人崔不意在此教民力耕，“勤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